

GUO
JI
GUAN
XI
ZHONG
DE
MIN
ZU
WEN
HUA

全球化最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蕴含并决定着民族国家未来价值观的走向。因此，文化发展是一个国家战略命题。

文化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有停滞与倒退的现象，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文化的多元化是世界发展的内在逻辑，但传播技术资源占有量的不均，使世界传播的语境和意识形态话语权均被发达国家主导。全世界的民族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地折射着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文化观层面的认知能力和宗教信仰体系强有力地影响着民族国家理解和对待国际问题的角度，决定其政策选择方式。因此，有必要把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视为不同政治社会之间的文化关系。

国际关系中的 民族文化

朱虹/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国际关系中的民族文化

The National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朱 虹 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关系中的民族文化/朱虹著.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80181-949-9

I. 国… II. 朱… III. 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3656 号

国际关系中的民族文化

朱虹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 28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电话: 010—64269744 (编辑室)

010—64295501

010—64266119 (发行部)

零售、邮购: 010—64263201

网址: www.cctpress.com

E-mail: cctp@cctpress.com

北京中商图出版物发行有
限责任公司发行

嘉年华文有限责任公司排版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6.75 印张 166 千字

2008 年 11 月 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81-949-9

定价: 20.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64242964

代序：文化战及其限度

一、我这篇文章其实是一篇读书札记。这并非是要炫学，而是由于我对谈论文化问题有格外的警惕与谨慎。“文化”是个过分有伸缩性的题目，从文人到人文尽在囊括之中，所以言说起来极易不着边际，做些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论断，争论起来也往往驴唇不对马嘴。凭空讨论文化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将极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并将某一种文化理想化或者——套用一句时髦词汇——“妖魔化”。尽管我们对 20 世纪文化论争的空泛与武断屡有检讨，但检讨之后仍然是积习难改。当然对文化的宏观之论读来也不无启发，但说实话从 20 世纪 10~80 年代再到今天，这样的启发我们也受够了。所以我宁愿小心行事，小处着眼，从具体文本与具体问题入手：在这里，读书札记这种文体对于我的文化讨论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自从 1993 年亨廷顿发表了她的论文《文明的冲突》，文化斗争的问题重又敏感起来。尽管后来成书时火药味有所冲淡，但是亨廷顿仍然坚持了他对未来文化冲突的预言。此时，我们再读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对以往数世纪中东西文化的敌对愈生会心。更兼随着新技术、新经济而来的产业的文化化与文

化传递的便捷化，与文化的东西之辩相交织的南北之争日益显著，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呼声不绝于耳。新斗争引发了我回首老斗争的兴趣，遂对冷战期间美苏两国的文化争夺有所翻检。恰好我在旧书店先后搜得三本相关的书，一本叫《文化事务与对外关系》（Culture Affair and Foreign Relations），American Assembly, 1963；一本叫《宣传与冷战》（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Public Affaris Press, 1963。前两本都是论文集，均出自美国官、产、学三界国际文化关系与文化战专家之手。第三本是《帝国主义的“心理战”》，作者是苏联人布尼亚柯夫与科莫洛夫，何宁译，群众出版社1963年版（下文中将这三本书依次代称为A、B、C）。对照阅读，不乏感慨，亦多联想。

二、读完这三本书，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文化战”这东西确实存在。我当然原来也没有天真到不知道它存在，但读完三册言之凿凿的白纸黑字之后对其真实性的感知要深刻鲜明得多。苏联人厉声控诉美国的文化攻势，美国人亦反过来控诉苏联，同时也研讨“文化战”之道。A、B两书就是美国人对文化战的讨论集，客观上像是自供状，因而读下来对美国进行文化战的内心活动与战略战术了解颇多。冷战时的文化战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自然冲撞（如亨廷顿所论列），更有异于今天美国国内不同族群间的文化博弈（也被称为文化战），它是国家间以文化为武器展开的一场利益斗争。文化在这里既不是纯洁的自我呈现，也没有被尊崇为至高的目的，而是被降低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文化本来就有两面性，既有纯粹的一面，也有不纯粹的一面。纯粹的一面是指文化作为人类经验、智慧与情感的结晶，是各民族共有的财富，可以通过自由交流增进共

同福祉；不纯的一面是指它也可以被工具化，用来追求对他者的征服与统治。对于这后者我们也许不喜欢，却也不能回避或掩盖：“文化战”就属后者。

美国政府的文化斗争机器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应对戈培尔的纳粹宣传而设立的，冷战开始后转而对付苏联。至于为什么要选择苏联作为文化敌人，或许主要倒并不是因为苏联是共产主义国家，而是因为它作为一个工业大国是与美国争霸的主要力量，反对共产主义不过是美国可以便捷运用的文化武器。在《文化事务与对外关系》的引言中，美国官员罗·布拉姆（Robert Blum）直言“这本书讨论的问题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对这个国家保持领导地位的能力有深刻的影响”。三十年后另一位美国官员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他的《注定领导》（Bound to Lead）中更将美国文化看作是保证美国领导世界的“软力量”。因为占据着文化的传播通道就可以创设国际制度并影响他国的选择，使其欲美国之所欲。

国家利益是文化战的原动力，当苏联将社会主义的普世理想转变为民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我们称之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文化包装之后，它同美国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分别的。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言，苏美的文化攻势都包含着敌意，也都带来过伤害，所以中国当时一方面还击美国，一方面与苏联论战，这种图景是我们在回忆历史时不可以简化与删改的。

文化斗争往往意味着欺骗、粉饰与歪曲，尽管它有时也说些真话。苏美两国大概都做过很多掩盖事实的工作。苏联人反复揭露美国造谣撒谎，至少美国人自己也公开主张将“限制日游”作为一种宣传策略，大名鼎鼎的盖洛普（George Gallup）就号召要小心翼翼地引导客人参观美国，“不要立刻将客人带

到地窖与阁楼让他们看我们是多么坏的管家，而让他们看我们最骄傲的东西”。文化战更可怕的是，当一方说真话时也往往并非出于求实求真的美好天性，并非是无心为善的天籁，而是为了掩饰更大的谎言或谋求整体性宣传效果，是一种以退求进的“策略性诚实”。而当一方真正表现出自我批评的诚意时，其言语往往被对方用来作为反对他的炮弹，对手是不会因为他的诚意而手下留情的。1956年赫鲁晓夫对苏联历史的诚心检讨立刻被美国人利用做口实，而马克·吐温与门肯对美国国民性的自我解剖也被苏联人派上了同样的用场。这不禁使人感慨“文化战”让人类付出了多么大的道德代价，它是多么坏人心术，它将人类推向了空前的世故，而且以文化的名义亵渎了文化这一人类保存诚意与良知的灵魂家园，让人对人本身心生绝望。所以美国人自己有时也为“文化战”或“心理战”的叫法感到羞耻，并为它找到了一个更好听的名目叫“政治传播”。

三、既然诚意被有意地用做武器，诚意和假意有时就很难区分，甚至在“文化战”中区分他们往往没有意义。比如说美国的言论自由，据它自己说那是因缘于对自由的尊重，而它的对手就揭露说那是虚伪的，不过是对公民思想一种更巧妙、更隐蔽的控制方式。美国的报刊确实是自主的，但也确实存在着垄断与金钱操控的现实；而且最终美国比苏联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达到了更牢固的统一。对于这种思想统一，以鼓励多元思想为标识的言论自由制度成为一种特殊黏合剂。20世纪60年代以坚决反主流自命的新左派活动家洛克(William P. Rock)在70年代坚决回到了主流，他的理由就是美国主流居然能够容忍新左派的文化反抗，那就没有必要再去反抗它了。这种逻

辑虽是曲折的，但确实是真实的。

何种文化管理体制才最有功效，这个问题也进入了美国文化战略家的论域。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一方面有人在苏联的强大宣传攻势面前嗟叹弱小，抱怨像好莱坞这样的民间文化社区不听招呼、各行其是；一方面又有人认为来自民间的文化传播比政府赤膊上阵的文化战更自然、更可信、更有感染力，因而主张要大力扶植并容忍民间文化力量。事实上，好莱坞与诸多的民营文化传播企业在传扬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方面所取得的成效确实是巨大的，它们的确没有使那些为它们说话的战略家们失望，这一点马尔库塞尤其是萨义德的分析是相当可靠的。对于苏联文化体制在斗争中的长处与短处，耶鲁大学政治教授弗·巴格亨（Fredric C. Barghoom）做了仔细的辨析。他认为舆论集中于政府手中，将一切文化都有意识地变成宣传会使苏联在短时期内形成优势，但在长时段中一致的口径会带来单调与厌烦，文化的集中掌控会使文化生产变成教条化、官僚化的虚应故事，从而丧失文化所不能须臾或缺的活力与灵魂。久而久之连克服这种活力衰减所采取的努力也是策略性的而非本质性的，因而不能真正奏效，到最后甚至这种努力也没有了。

纵观美苏文化战，20世纪30年代是美弱苏强，60年代打个平手，90年代美胜苏败，甚至连戈尔巴乔夫这样富有个人素养的苏联领导人也被不读书之辈的里根与撒切尔夫人领导的意识形态攻势所俘虏。苏联的这种结局除了种种背景因素外，巴格亨教授所分析的文化战略与战术的失当大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中间还有一个为巴格亨教授所忽略的情节，那就是文化与现实有互生关系，文化既受制于现实也塑造现实，丰富而

正当的文化为现实社会的健康发展所必需，它会对现实有校正与改善作用，因而文化的枯竭也会逐渐削弱一个社会的现实生存力量。

四、文化战略与战术实际上都是一种“术”，而中国人在传统上更崇尚“道”。在文化上，“道”性的追求显得更加贴切与恰当。尽管现实生活中“道”与“术”很难分辨，连《老子》这样的道书也有人以小人之心说它是兵书，但至少求道之心可以达成一种自我认识并实现一种自我满足。回顾美苏的文化战使我们从一个侧面觉悟到了人类的渺小，因而更使我们感到道心之可贵。“道”不是一种虚幻缥缈的境界，它有自己真实的疆域，它就从权谋与诡计停止的地方开始。文化战中其实没有真正的胜者。尽管你可以摧毁对方的意识形态，但你在这种斗争中所采取的操控与运用手段也同时使你自己丧失了真正的文化品性，堕入了思想的黑暗与情感的恶趣之中，危害了你的生存健康与生存安全。在我看来冷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美国人带来多少文化进步和文化提升，相反还使这个国家人性化的程度有所降低，它领导的几次战争就是例子。

在这文化市场激烈争夺、利益与思想尖锐对立的婆婆世界，主张文化上的道心似乎显得迂远，尤其是中国在外来文化产品的冲击下还处于弱势。但正因为争夺、因为弱势才更有坚持道心的必要。难道我们也建立像好莱坞那样制造模式化梦幻的文化工业来对抗好莱坞么？想一想都是一个噩梦。难道我们也用美国传媒歪曲中国的方法去歪曲美国么？似乎这也把我们带不到什么福地。文化本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它的力量只存在于人的诚意中，一旦人们起了机心要利用它，它的精神实际上就不存在了，因而也就不堪利用了。用佛家的话说就是“无心

恰恰用，用心恰恰无”。堵截更非良法。如果我们能树立起热爱文化、涵养文化的大公之心，树立起为文化而文化的辽远情怀，老老实实在地鼓励文化创造与文化交流，用民族文化整体的繁荣与强大去显示竞争（而非仅仅是斗争）力量并争取国际文化生存空间，庶几可以摆脱文化战的恶缘。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也是人、人类的本质属性，也是人的目的，我们常说的精神极大提高、人的本质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状态。所以卢卡契说人类不仅要获得经济解放，而且最终要从经济中解放出来。“获得经济解放”，就是摆脱贫困，走向极大的富裕；“从经济中解放出来”，就是在物质不断富裕的基础上，摆脱物对人的统治，达到很高的文化境界。

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论述文化及文化建设问题，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用“大发展大繁荣”、“新高潮”这些醒目的、不寻常的词汇来号召开展文化建设，表达了党发展文化事业的迫切愿望。其间也包含着党对中国文化发展滞后性的清醒认识，对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的强烈感知，对人民文化需求与文化权利的深切关怀。用这么大的决心来建设文化，也表现了党执政理念的健全与成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仅要经济、政治、社会负责，也要对文化负责，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负责。保护文化，延续斯文，责无旁贷。

相对于物质满足，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相对于当代国际政治问题，文化是一种诉诸长远、诉诸千秋万代的视野与情怀。一个人的人生要有意义，得有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要想传诸久远，也得有文化。文化赋予个人、社会生活更丰富

的内容、更高的境界，也赋予国家、民族更高的觉悟、更高的文明水准、更强的思想与情感认同，使其不败。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文化也是一种特殊的人道主义关怀。

“软实力”最早是个国际政治概念，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论述美国国际实力的著作，其含义是分析国家的非经济、非军事力量怎样在国际争夺中发挥作用。在国际关系领域，文化被定义为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其实类似的思想出现还要更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的“心理战”。软实力的概念是从国家关系的功能角度对文化作用的一种理解。当然我们对文化意义的理解要宽广得多，文化的意义远不止于是实用的，它首先是我们心灵与情感的表达，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家园。我们建设文化首先是因为对文化的热爱与尊崇。但既然强大的外国直言不讳地要把文化当成对付别国的武器，我们也只好因应对之，奋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我们要认识文化的双重性。文化有和平的、纯洁的一面，也有不纯的、斗争的一面。说文化和平、纯洁的一面是指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人类思想、情感的结晶，同样为我们所欣赏、所珍爱。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也是属于中国的，孔子也是属于外国的。说文化有不纯的、斗争的一面，是指文化在国际斗争中总是被人用作工具，从最早殖民主义者利用英语与基督教来统治殖民地人民，到现在美国利用它的电影、电视、通俗音乐来传播其意识形态、扩张其国家利益，都是如此。加上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火上浇油，使文化的火药味浓烈起来。我们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就必须以增强自己的文化力量，增强国家的软实力来求生存、求

发展。

目前，国际文化竞争力的对比不容乐观。在国际文化领域，文化大国的外来文化倾销很严重，美国大片、电视剧、卡通片遍布全球各个地区。连韩国影视剧作也对我国大量倾销，这在二十年前是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片子大都说不上是什么优秀的艺术作品，而是按类型片模式、程式化手段生产出来的文化工业产品。无奈的是恰恰是这种东西赢得了世界的观众。

1999年我见到约瑟夫·奈，同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喜欢好莱坞大片。他说不仅你们中国知识分子，法国、意大利的知识分子也不喜欢好莱坞，但知识分子喜欢不喜欢关系不大，关键是中国人民、欧洲人民喜欢。不幸的是他所言不虚。这是非常复杂、非常棘手的文化现象，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并存，在文化应对上很不容易。

在学术研究方面，理论、概念和范式也大都源自西方，这些外来理论对开扩我们的视野、激发我们的思维和认知都有好处。但中国缺乏我们自己的学术概念、学术思想也是重大缺陷，既不利于外国学界了解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也不利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准确、深刻地认识中国自己的事情。

外国文化能在中国倾销，是因我们有文化真空，我们要使自己的文化繁荣起来、充实起来，只有迅速、有力地推进文化建设、增加自己的文化实力一条途径。

面对极其严峻的外来文化挑战，我们的国家文化建设要尝试一些新的思路，不能再墨守很多成规，因为在文化上，解决问题不能仅靠观念层面的斗争，更重要的还是要靠文化实力上的竞争。一方面我们要有开放的胸怀与广阔视野，广纳外来

的优秀文化，任何有意义的文化创造都必须在开放环境中才能实现；另一方面，我们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搞好我们自己的文化产业链，有文化的自强之心，兴起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同时，文化发展又是一个漫长的、有时是一点一滴的积累过程，我们还得有足够的耐力与耐心。

中央党校校委委员、教务部主任

李书磊

2008年10月

前 言

世界是一个整体，文化代表意义的世界。人类历史的发展，原动力是生产方式的进步，同时也是不同文化的交汇与分流。世界各民族、各区域多元文化没有绝对的高低优劣之分。正是千百年来多元文化的撞击，绘成了人类社会的五彩图景。人类共同创造的璀璨文化，构成不同的世界文明体系。文化的交流方式与传承性使得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而独立发展。

文化具有民族性，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和国别特征。民族文化代表一个民族的特定身份和价值理念，属于国家主权的范围，也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在当代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的互动中，无论是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民族文化都已经成为主要的驱动因素。冷战后民族国家十分重视文化外交，注意发挥文化在国际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软作用。

近年来，不少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一直在潜心研究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与国家外交政策、国家安全之间必然的、内在的关系。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文化的认同、文化全球化、文明的冲突模式等相关理论，试图建构新的文化研究范

式。一系列研究成果已经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文化在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相互作用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演进。

文化的繁荣需要建立在经济社会共同进步的基础之上，需要兼顾物质富足和精神充实两方面。中国学者也加强了对民族文化、政治文化和文化全球化等方面的研究，尤其关注东亚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文化从不平静，国际关系中的跨文化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冲突与动荡的原因之一，也是国家间文化主权斗争的重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强势输出，以覆盖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背景为目的，影响乃至震撼着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道德标准和社会规则。主权国家则努力抵御强势文化入侵，维护民族的文化特征。

全球化最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蕴含并决定着民族国家未来价值观的走向，十分重要。因此，文化发展是一个国家战略命题。中国是东亚文化大国，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国的汉字文化是大东亚区域文化之母。中国要在和平发展中建设政治和经济强国，也就必须建设东亚文化大国，因此文化战略命题也是中国必须直面的时代命题。

费孝通先生在《从反思到文化自觉与交流》的文章中提出，当今时代的要求是“文化自觉”。针对民族国家而言，生活在一定文化环境中的民族对本民族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对自身存在的局限和缺点要有自知之明；对民族文化未来的发展历程要有充分的认识。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民族，在对本民族文化自知之明的基础之上，要了解其他民族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中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深入人心。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和谐、和睦、和平为主要内涵，含有协调、包容、平衡的智慧，博大精深，在国际关系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人类社会越进步，看待世界的角度就越多样化。因此，民族国家在文化上的宽容和认可，具有不断扩展和平环境和丰富人类交流视角的进步意义。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在推动国际共识的达成，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合作与对话中发挥大国作用。

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国家要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和平相处，就必须建立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彼此宽容、共存共荣的国际关系体系。本书从全球化压力下民族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复杂现状这一视角出发，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共同发展为目的，运用历史与现实纵横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十个层面具体分析民族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作用。

本书旨在认真思考弘扬民族文化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深远战略意义；着重探讨当今世界民族文化与国际关系的互动，试图从动因中寻找出互动的规律性。

这是民族和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作者

2008年10月

目 录

绪 论/1

第一章 世界文化的独特与多样/3

第一节 世界主要文化体系/4

第二节 世界主要文化价值观/9

第三节 世界主流文化/13

第二章 民族文化的国别特征/24

第一节 文化圈中的国别特征/25

第二节 意识形态中的国别特征/31

第三节 区域组织的文化特征/35

第三章 文化力是国家软实力/40

第一节 文化软权力的内涵/41

第二节 软实力与国家主权的关系/45

第三节 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反思/49

第四节 政治力与文化力的相辅相成/52

第四章 国家间的跨文化传播/58